

doi:10.3969/j.issn.1672-0598.2025.05.002

“五个必须统筹”:新时代经济建设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学习体会*

曾宪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五个必须统筹”是收录在《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的重要内容,代表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发展。“五个必须统筹”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对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每一部分都包含了当前经济工作的前沿问题,各个部分具有紧密关联。“五个必须统筹”的提出具有深刻的背景,它是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保持较高经济速度、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对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动、稳步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五个必须统筹”具有深刻的内在特质,它反映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建设多目标协同的特性愈发突出,我国由追随型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变的过程需要平衡好诸多方面的关系,当前改革需要处理好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表层矛盾与深层矛盾。“五个必须统筹”的关键任务则包括形成“放得活”与“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构建协同发力、动态平衡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处理好“新”与“旧”“质”与“量”的关系等。

关键词:“五个必须统筹”;有效市场;扩大内需;培育新动能;系统观点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5)05-0013-09

2025 年 3 月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是全面展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著文本,它收录了从 2012 年 11 月到 2024 年 12 月跨度达到 12 年的 74 篇文章,均是各个时期反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精华文章。其中,《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是 2024 年 12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章作为《文选》的最后一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内容,而这篇文章提出的“五个必须统筹”(即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1]556-558}是当前时期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指导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 收稿日期:2025-06-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01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内涵和建设路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交办项目(2024YZDJ02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研究”

作者简介:曾宪奎(1977—),男,山东青州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和产业经济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曾宪奎.“五个必须统筹”:新时代经济建设的关键所在——《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学习体会[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5):13-21.

一、“五个必须统筹”概述

“五个必须统筹”是当前时期我国经济工作中必须处理好的重要关系,主要包括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等五对关系。要把握好“五个必须统筹”,必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理解。

第一,作为一个整体,“五个必须统筹”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对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五个必须统筹”是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刻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我国经济领域突出矛盾的成果,它既是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2]。“五个必须统筹”涉及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指标(总供给和总需求)、经济发展的主导任务(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资产管理的调整导向(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这是当前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肯綮所在,解决好这几个问题,我国经济发展进程就能保持顺利。这5个组成部分相互支持、彼此联系、协同推进,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

第二,每一个“必须统筹”所涉及的一对关系,均是当前经济工作需要均衡处理的前沿问题。从具体内容看,每一个“必须统筹”均涉及到两项具有一定对立性但彼此之间又紧密联系的任务,其具体内容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前沿问题。例如,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是在我国进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调控经济能力与水平大幅提升的情况下,继续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沿问题。同时,具体的工作任务如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市场规则、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均是目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沿任务。又如,培育新动能与更新旧动能,涉及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等前沿内容。当然,每一项“必须统筹”相互对立的两部分任务,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性,部分内容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此进彼退”特征,需要在实践中高度注意协调二者的关系,使其关系处于合理区间。

第三,从“五个必须统筹”之间的关系看,它们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具有相互促进、共同推进的特征。首先,第一个必须统筹(即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与其他4个“必须统筹”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即前者服务于后者。事实上,要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一个前提条件便是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其创造制度基础,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便是要进一步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科学分工、合理协作、有效搭配。例如,要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就必须要进一步强化国内需求、提升国内供给水平与效率,而这需要采取一系列涉及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改革,提升国内需求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就需要采取措施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强人们的消费意愿等,而这涉及到收入分配改革、社会福利改革、消费便利措施的制定等一系列内容。

其次,除了第一个“必须统筹”外,其余4个“必须统筹”之间是紧密相关、彼此促进的关系。其中,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3对关系之间,均与实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保证一定经济发展速度的协同目标息息相关。例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目标是要实现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发展之间的协调,推动新旧动能之间平稳持续转换,这不仅有利于稳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还能保证经济发展速度的稳定;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实质上就是要实现已有资产与新增资产、已有资源与新增资源之间利用效率和资源质量的提升,在保证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的同时,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则更为明晰地反映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做大经济规模

之间的关系。同时,这3对关系之间,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这体现在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与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两对关系之间,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因强调的角度不同而不能完全等同,但是在本质上两对关系之间存在一定的等价性,做优增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培育新动能,而盘活存量和更新旧动能之间也具有高度关联性;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可以看作是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存量和盘活存量两对关系的结果,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目标。

二、“五个必须统筹”的经济背景分析

“五个必须统筹”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从经济方面,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一是“五个必须统筹”是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的必然要求。当前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正持续纵深推进,以创新为核心要素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的紧迫性日益增强。这就要求我们加快经济发展转型、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统筹好当前时期的诸多相关因素,形成合力,解决当前时期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的关键矛盾,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向更高水平不断跃进。

例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能够为科技创新、未来产业发展创造最佳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其核心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从创新的角度看,当前时期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实现由量的积累向质的突破飞跃,即在前沿科技领域进入第一阵营,在传统产业科技领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有利于持续创新、深度创新的政府—市场环境:必须改变过去过度强调大幅度政策补贴、人为推动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以市场竞争促进科技创新动力的持久性。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内,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企业规模小、创新能力与意愿低的问题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策激励企业创新,是提升企业创新动力、加快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性产业政策具有偏重新产业、大企业的倾向,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从长远上对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竞争力提升不利。在当前阶段,这一产业政策类型造成的问题日益突出,亟须创造有利于长远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例如,有研究表明,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相关政策(如公平竞争审查)能够提升行业竞争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减少信贷资源的错配,进而具有明显的创新效率增进效应^[3]。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恰恰是当前时期这一要求的具体反映。有为政府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强调政府在宏观法律、经济体制构建以及具体管理活动上“做好该做的”,不断优化企业运营与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尊重市场规律的发挥,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有利环境,为企业创新行为提供正向激励。

又如,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与科技创新及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显然,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加快科技创新,加速未来产业发展又是其中的主导因素。但是,旧动能所在的传统产业也并非不能构成新质生产力的来源,积极的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够使其摆脱粗放式发展模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来源。特别是考虑到许多未来产业如人工智能,其发展潜力覆盖的范围不限于自身所在产业,还通过对其他产业赋能而覆盖传统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筹培育好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能够最大限度地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规模与速度。

二是“五个必须统筹”是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尽管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我们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就不重要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由2011年以前年均8%以上的高速增长向当前时期年增长率5%左右转变,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至关重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24年我国人均GDP为1.34万美

元,要在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以人均GDP2万美元作为标准,则之后11年的年均人均GDP增长率不能低于3.7%,如果以葡萄牙2023年人均GDP2.73万美元作为标准,则增长率不能低于6.7%。整体来看,考虑到汇率可能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标准的变化,人均GDP的增长率应该保持在4.5%到5%之间比较适宜。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要立足实践,强化“五个必须统筹”,稳步推进“先立后破”,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例如,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能够为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本质就是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其中,做大总量与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密切相关。又如,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是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巨大规模的资产,同时新增资产规模也在迅速提高,但是部分存量资产存在着运营效率较低、相对债务过大等问题。这种情况下,采取积极广泛的措施,盘活存量资产同时不断提升新增资产的质量,将有效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同时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三是“五个必须统筹”是应对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动、稳步推进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当前时期,国际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呈现逐步提高的态势,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直接负面影响。例如,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抬头,特别是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禁运措施,对我国的外部需求(主要即出口)和关键零部件进口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从出口数据看,2008年之后我国出口数据保持了较高增速,从2008年的14306.9亿美元增加至2024年的35742亿美元,整体增长速度较高,但是个别年份出口额增长较为缓慢,如在特朗普的第一个美国总统任期(主要是2017年到2020年)内,出口额从22633.4亿美元增加至25899.5亿美元^①,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在当前特朗普第二次担任美国总统后,频繁对其他国家发出贸易制裁威胁,我国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五个必须统筹”做好应对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动以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便至关重要。例如,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关键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大体一致。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我们要努力保持国际市场的稳定性,保证出口不会出现短期内急剧下降的状况,以避免由此导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另一方面,要积极扩大内需,稳步提升内部比重,逐步降低国内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从而减少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在冲击。

三、“五个必须统筹”的内在特质解析

根据“五个必须统筹”的主要内容以及提出背景,其内在特质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是“五个必须统筹”反映了我国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多目标协同的特性愈发突出。改革开放后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单一目标导向,即在涉及到两个方面的目标上,过分强调单一方面的目标,而对另一方面的目标重视度不足。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济规模小、人民生活贫困,因而在较长时期内,在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追求较高的经济速度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经济发展质量在较长时间内受到的重视程度不足。而在总供给和总需求方面,目标导向较为复杂。在1997年之前,我国基本处于卖方市场状态,因而在这一时期之前总供给不足是核心矛盾;从1997年开始,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开始逐步显现,同时弱势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因而自这一时期开始,我国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关系开始复杂化。一方面,加入WTO后出口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4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2024年的出口数据以2024年全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7.1217元人民币)进行了换算。

的迅猛增长,较好地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因而在一段时期内,扩大产能、不断做大弱势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主导任务;另一方面,国内需求方面,投资迅猛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在2008年之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内需求不足、国内供给效率低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整体来看,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总体政策是强调通过财政政策、投资政策扩大内需,同时在供给端强调扩大产能,而对于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提升供给效率方面的政策有效度相对不足。另外,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政策缺乏有效衔接,最终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结构性失衡问题日益突出。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体系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各领域目标在发展速度与质量方面的协调性要求越来越高,强调单一方面目标、各领域目标缺乏有效协调的状况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经济发展的多目标协同特性则越来越突出。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就特定领域而言,发展目标逐步呈现多元兼容特征。例如,在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既要保证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又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又如,在总供给和总需求方面,更加强调二者的联通,保证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能够匹配,为经济体系畅通运转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经济体系的各大板块之间,发展目标的协同性、联通性、相互支持性等特征日益增强。例如,通过强调总供给和总需求协调、新动能培育和旧动能更新、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等经济发展板块的协调,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是“五个必须统筹”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深度转型期,追随型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变的过程需要平衡好诸多方面的关系。当前时期,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即由追随型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变,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诸多方面的特征、任务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在技术创新方面,这体现为由模仿创新、赶超型创新向原始创新转变;在科技创新方面,这体现为由注重后端的商用技术创新向注重中前端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转变;在企业竞争力方面,由低成本竞争力向依托技术创新的核心竞争力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平衡诸多方面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处理好转型前经济体与转型后经济体的关系,使二者之间的转换在稳定状态下顺利完成,而不带来过大的社会成本。以企业竞争力转型为例,这一转型并非无成本、自然而然地完成,而是具有较大的成本,如部分企业会因为无法适应这一转变而倒闭。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必须保证传统的成本竞争力不至于过分下降,从而避免过快更新企业竞争力进而保证企业正常运转;在这一前提下,促进企业逐步提升核心竞争力,逐步摆脱过度依赖低成本竞争力的局面。从“五个必须统筹”的角度看,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做强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实质上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经济转型过程中新、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三是“五个必须统筹”反映了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需要妥善处理好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表层矛盾与深层矛盾的关系。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这具有两方面的内涵:第一,我国改革事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易于改革的内容以及比较突出的表层问题、短期问题已经逐步得到改进,而较难见到成效、错综复杂的深层矛盾和具有长期影响的问题成为下一步改革的主要对象。这些问题错综复杂,不同问题之间相互影响、彼此牵制,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要注重统筹各方面的关系,分步骤、有次序地逐步对这些问题与矛盾予以解决。“五个必须统筹”中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例如,政府的越位、缺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深层问题导致的,如食品安全监管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原因是多方面,既有监管难度大、政府部门监管能力弱等监管部门的原因,又有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好政府与市场关系,通过二者之间的协调共进,逐步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积极探索增进政府监管能力的各项举措,逐步提高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如当前时期借助大数据等新技术,组合不同监管主体与工具实现“多元共治”^[4];另一方面,通

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强化市场秩序等手段,增进市场机制在食品安全领域“优胜劣汰”功能的发挥,逐步在经济层面祛除食品不安全的根源。第二,我国改革涉及的问题日益复杂,进一步改革措施必须要妥善处理不同问题之间的关系,之前通过局部改革的累积而实现系统优化的改革模式正在失效,而在不同领域之间协调改革进程、注重不同领域改革进度相对一致的改革模式正在成为主导方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5],正是基于这一趋势而言。“五个必须统筹”通过对5个方面的两对具有对立属性的主体的关系进行协调,以系统性方式解决了不同领域改革的关系,保证了改革以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方式推进,实现改革效率的最大化和效果的最优化。

四、当前时期坚持“五个必须统筹”的关键任务

依据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当前时期我们坚持“五个必须统筹”的关键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统筹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键在于形成“放得活”与“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当前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客观上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核心在于保证政府“管好该管的,放开不该管的”,重点就是解决政府的缺位与越位问题。

一方面,补足政府缺位,是保证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的前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相辅相成,只有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为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创造前提条件并弥补“市场失灵”,才能保证市场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例如,只有建立完善的法治体系、营造良好的信用体系、建立完善的市场规则、不断优化市场秩序,才能保证各经济主体在公平竞争环境中谋取发展,在宏观上保证优胜劣汰的市场正向竞争结果。当前时期,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迅猛发展,一系列市场监管的新空白正逐步涌现,政府监管缺位等问题也逐渐涌现。例如,随着大数据的持续发展,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如何对基于要素产生的收益进行有效分配并在法律层面对各方的合理经济权益加以保护,正在成为当前法律与政府监管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大数据的发展,又使个人隐私的问题日益尖锐,如何在数据收集、使用过程中,真正保护个人隐私,处理好个人隐私保护与大数据合理使用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法律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补足政府监管缺位,既需要将我国之前各项体制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加以解决,还要填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新出现的监管空白。

另一方面,解决政府的越位问题,实质就是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这是当前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突出问题。改革开放之后40多年的历程,整体来看就是政府对经济干预范围逐步缩小、市场机制作用逐步扩大的过程,应该说,当前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较之前阶段大为优化^[6]。但是,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政府越位问题,如对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运营行为施加不当干预,特别是在最近几年经济发展速度放缓、部分地区面临财政赤字突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现象有所抬头。在这种情况下,明确政府与市场各自职责,确保政府在不该出现的领域坚决退出,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是当前时期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的焦点问题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就要完全避免,在一些特殊领域要酌情保留。例如,在产业政策领域,具有公平竞争导向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是当前产业政策转型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就要退出。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一定政策支持,否则,其发展进程将面临一系列因素制约,有可能在较长时期陷入低速发展陷阱^[7]。特别是在当前时期,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意在加速未来产业发展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强化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8]。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保留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产业政策,通过政策扶持加快未来产业发展,只是其范围、持续的时间要严格控制,防止选择性产业政策泛化。

二是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键在于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供给

与需求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1]162}。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方面，重点需要把握两点：第一，在数量上，二者要保持大致相等。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数量上保持大致相等，意味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转换无碍，不会产生经济浪费，整体经济效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从我国当前情况看，在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数量关系上，突出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即外需的不稳定与内需不足。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通过积极广泛的措施，如提高出口质量、优化出口国别结构，努力保持甚至逐步扩大出口的规模；另一方面，要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断扩大内需的规模，逐步转变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问题，使我国能够在需求问题上保持战略主动。第二，在结构上，二者要保持动态平衡，防止出现结构错配。较长时间以来，我国在供需结构上存在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体系无法满足需求体系变动，主要体现为供给体系主要以大规模生产为主，部分高端、个性化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这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于2015年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所在。虽然经过10年时间的改革，我国供给体系的效率大幅提升，供给无法匹配需求的问题有所缓解，但是整体而言供给体系与需求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完全解决，供给体系效率的提升依然有较大空间。同时，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新的需求会不断出现，这也对供给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供给也可以走在需求之前，即供给主动创造需求，如部分高端手机就会通过引领潮流而创造需求，而这种情况更加需要供给体系水平与效率的提升。总之，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依然需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1]557}。

三是后3项统筹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新”与“旧”、“质”与“量”的关系，从而保证经济发展能够稳中求进。正如前文所述，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之间具有紧密关联，因而在此一并论述。结合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相关讲话及当前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与面临的问题，做好后3项统筹的关键任务主要体现为以下3点：第一，着力发展未来产业及新兴产业。全球经济发展史表明，未来产业及新兴产业是潜在的经济发展领头羊，具备成为未来经济新增长点的潜力，因此哪个国家在未来产业及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就能够对其国际经济地位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正在由追随型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过渡的国家，要实现弯道超车，就必须大力大力发展未来产业。当前时期，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未来产业方兴未艾，巨大的发展潜能正逐步显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阶段，加强未来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做好后三个统筹的关键所在。以人工智能为例，它的发展具有3个方面的影响：包括技术研发、软硬件开发、算法模型训练等核心产业的扩张效应、通过与其产业融合产生的赋能效应、潜在关联产业的“活化效应”（即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赋予这些产业新的发展活力），能够在广泛层面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9]。第二，以创新为依托，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步伐。实际上，高端产业与低端产业、新产业与旧产业、新兴产业与夕阳产业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我们能够有效加快传统产业、低端产业的升级步伐，使其产品和服务由低端向高端转移，进而大幅度提高产品附加值，使产业迎来新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有效减少传统产业低迷趋势，甚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规模扩张。在宏观上这就体现为经济增长稳定与经济质量提升的同步推进。第三，善于利用现有各种资源与资产，不断提高其利用效率，拓展新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存量资产与资源的规模持续扩大，其中部分资源的利用效率偏低甚至面临被淘汰风险。事实上，部分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其产权结构、地区结构不合理以及管理能力不足有关，通过所有者转换（如从运营效率低的所有者转让给运营效率高的所有者）、空间转换（如从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以及管理创新等方式，就能够赋予这些资源以新的活力，大幅度提升其利用效率。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国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和人口巨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不仅要发展未来产业、新兴产业

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在东部地区发展受限、需要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优先考虑转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而非转移到国外地区或者倒闭,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10]。

五、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所述,特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是坚持发挥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作用。在内涵上,“五个必须统筹”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高度一致。因此,在落实“五个必须统筹”上,无论是实现每个“必须统筹”内部的各项任务,还是协同推进“五个必须统筹”的复杂任务体系上,都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整体,能够作为指挥棒、红绿灯,保证“五个必须统筹”在整体把握上不走偏,提升政府部门对各项活动的掌控力。

二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推动“五个必须统筹”。正如前文所述,每个“必须统筹”内部的两对关系以及“五个必须统筹”之间的关系协调方面,所涉及的内容、相关因素错综复杂,不同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彼此牵制。因此,要处理好“五个必须统筹”内外部关系,真正保证其合成效果达到最大化,就必须要坚持系统观念,以全局性、整体性、动态性视角去看待和执行各项工作措施,避免用机械、僵化的方式去看待局部问题。

三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要求。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不仅是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适宜关系的具体改革方案,还是支撑其余4个“必须统筹”关系的有效保证。因此,各个地方应该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有关要求与规定,为把握好“五个必须统筹”打好基础。

四是各个部门和地区要高度注重政策的连续性与集成性,保证政策成效。“五个必须统筹”相关的政策涉及不同部门,部分政策还需要多个部门与地区协同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强化政策之间的集成性,避免政策之间相互冲突,从而影响政策的整体成效。同时,要注重新政策与旧政策有序衔接,尽量避免政策内容的急剧转变,必要的时候设置一定的缓冲期,以保证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能够有充足的时间适应。

五是注重政策的因时制宜与因地制宜。从辩证角度看,“五个必须统筹”内部的各项关系及涉及的各项政策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而应随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有所不同,并要允许各个地区根据自己实际状况制定适宜政策,一定要避免僵化地、“一刀切”式地执行相关政策。例如,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我们就要相对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在经济发展趋缓、内外部形势不利的影响下,我们就应在注意保证生态环保等硬性要求不变的情况下,在政策上相对更加注重经济增长速度,避免因经济增长速度过度下降引发一系列问题。又如,经济发达、科技创新能力强的地区,可以适度将更大精力用在培养新动能、提升质量等工作上,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科技创新能力相对弱的地区特别是老工业区,应立足本地实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更新旧动能上。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2] 李玉举,顾严.坚持以五个“必须统筹”做好经济工作[J].红旗文稿,2025(2):4-8,1.
- [3] 刘冰冰,刘戒骄.竞争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管理,2023(6):62-78.
- [4] 孙娟娟.政府监管优化的智慧化取向: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18-124.

-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1).
- [6] 刘元春.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23):28-35.
- [7] 曾宪奎. 探索推动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模式[J/OL]. 当代经济管理, (2025-02-07)[2025-06-06]. <https://link.cnki.net/urlid/13.1356.f.20250207.0952.002>.
- [8] 李伟. 产业政策兴衰起落与“再次回归”的理论逻辑[J]. 学习与探索, 2024(12):121-127, 193.
- [9] 郭朝先, 方澳. 人工智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机理、问题与对策[J]. 广西社会科学, 2021(8):8-17.
- [10] 安同信, 李光红. 跨越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陷阱——基于日本经验的借鉴[J]. 经济问题探索, 2016(2):122-126, 133.

“Five Must-Be-Coordinated Aspects”: The Key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Reflections on Studying Volume 1 of *Selected Works of Xi Jinping on Economy*

ZENG Xiankui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Five Must-Be-Coordinated Aspects” are important contents in Volume I of *Selected Works of Xi Jinping on Economy*, represent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The “Five Must-Be-Coordinated Aspects” are important strategic deployments mad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t its core at critical moments and juncture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ach part covers cutting-edge issues in current economic work, and all parts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The proposal of the “Five Must-Be-Coordinated Aspects” has a profound background. The “Five Must-Be-Coordinated Aspects” ar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for continuously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aintaining a relatively high economic growth rate,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responding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steadily advanc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Five Must-Be-Coordinated Aspects” have profound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y reflect that the feature of multi-objective coordin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a catching-up economy to a developed one, it is necessary to balance multiple aspects of relationships. Currently, the reform needs to address both long-term and short-term issues, as well as superficial and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The key tasks of the “Five Must-Be-Coordinated Aspects” include establishing an economic order that is “flexible” yet “manageable”, building a coordinated and dynamically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regate demand and aggregate supply, and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and between “quality” and “quantity”.

Keywords: “Five Must-Be-Coordinated Aspects”; effective market;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cultivating new driving force; system view

(责任编辑: 邓龙奎)